

理学学术丛书

◎ 向世陵 主编

理学

与现代新儒学

许宁 著

宋元明清学术围绕以理学为主干的儒学共生繁荣，合力推动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化走向最后的高峰。理学内容的丰富性折射时代思潮的多样性，既要入其内，更要出其外，既有理学与释、道、易各家及周围社会的横列，也有从宋明到现代的纵贯。理学的时代虽离我们远去，但通过它而传承下来的中国文化命脉仍然在代代流传。



理学学术丛书

向世陵 主编

理学 与现代新儒学

長 春 出 版 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学与现代新儒学/向世陵主编.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1. 1

(理学学术丛书)

ISBN 978-7-5445-1566-5

I. ①理… II. ①向… III. ①理学—研究②新儒学—研究 IV. ①B244.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6387 号

理学与现代新儒学

著 者: 许 宁

责任编辑: 杨爱萍

装帧设计: 徐力坚

出版发行: 长春出版社

总编室电话: 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邮购零售电话: 0431-88561177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www.cccbs.net

制 版: 吉林省久慧文化有限公司

印 刷: 吉林省吉育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3.25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431-84652148

序

张立文

宋元明清是理学文化由造极走向衰微的时期。两宋是中华文化学术、哲学思想、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造极期。所谓造极是指度越汉唐、和合三教、学风创新、学术繁荣的新时代，是学术多元、学派林立、大师辈出、自由论辩、成果辉煌的新时代，这是中华文化的和合创新，中华学人的智慧凝练，五千年文脉的绍承发展。

一、社会思想的冲突与危机

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造极^①，究其原因是由内外因缘所造成的国家、社会、人生的冲突和危机，与在回应化解冲突和危机中开出宋明理学。

第一，积贫积弱的冲突与社会危机。积贫是指民贫国贫，北宋王朝“不抑兼并”^②、不立田制的政策，致使农民大量失去土地，土地是农民的生命田，无

^① 陈寅恪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参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② “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参见《食货志·农田篇》，《宋史》卷一七三。

田农民就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加上赋税盘剥，地方官吏从中渔利，徭役苛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以致卖儿鬻女，离乡背井，四处逃亡。势官富姓，田连阡陌，70%土地被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者所占有，国家财政收入减少，造成了国贫。民贫国贫，危机深重。

积弱是指国家军事力量衰弱，无战斗力。赵宋政权有鉴于唐末藩镇割据，拥兵自重，以及五代十国的战乱，便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将领军政权力，采取了“强干弱支，致治于未乱”^①的政策，防止了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的分庭抗礼及将领兵变的内乱，但亦削弱了军事力量。军权集中于帝王的结果，导致兵不识将，加剧了积贫积弱的冲突和危机。北方和西北方的辽和西夏不断发动掠夺性、破坏性战争。宋真宗赵恒景德元年（1004年），辽兵大举入侵，进逼澶州，宋军虽在河北军民支援下，击败辽军，但订立了屈辱的和约，每年给辽白银和绢。西北方在西夏侵犯下，也节节败退，被迫与西夏缔结和约，每年亦给西夏白银、绢、茶叶等。宋廷内忧外患，危机煎迫。虽前有“庆历革新”，后有“熙宁变法”，但是由于朋党之争，政见冲突，新法行而又废，终不能挽北宋被金灭，南宋被元灭之命运。

第二，社会伦常的冲突和价值危机。中国传统社会，要求典章制度完备，伦理道德有范，社会安定有序，价值观念有定。然而，唐末藩镇割据，农民动乱，五代十国长期混战，中国社会又一次陷入人大分裂、大动乱局面，致使纲常失序，道德沦丧，理想失落，精神迷惘，而构成价值颠覆和意义危机。“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欤！”^②“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③两宋学者面对的是一个贼乱之世以后的礼崩乐坏、三纲五常道乖、宗庙朝廷失序、制度文章扫地的形势，宋代知识分子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加强社会凝聚力，必须担负起重整伦理纲常、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重建价值理想、终极关切、精神家园等形而上信仰系统与形而下的实践系统的

① 司马光：《收诸道精兵》，《涑水记闻》卷一，第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② 《唐废帝家人传》，《新五代史》卷十六，第1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③ 《晋家人传》，《新五代史》卷十七，第1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责任。基于此，两宋的知识分子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开始谋求富国强兵之策。而要富国强兵，又必须实行改革，才能担当外御强敌，内安民心的重任。但是“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失败，却使北宋愈趋衰弱。

由于原有的价值观念、典章制度、社会秩序已被摧毁，两宋知识分子必须肩负起超越以往的思想观念创造新理论思维和新学术形态的职责，以人文关怀化解信仰体系和道德体系的瓦解和破坏，以新的价值理想和终极关切，重新焕发新的信仰力量和道德力量的召唤和敬畏，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博大情怀、天地意识为天地生民安顿安身立命之所，以适应新时代、新思维的需要，于是一种“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道德形而上的理论思维形态应运而生了。

第三，儒释道三教冲突和文明危机。自汉以来，印度佛教文明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伦理道德、社会心理、思维方式、行为规范、风俗习惯发生了激烈冲突。当两种异质文明发生冲突时，实际上是一种交流互动状态，它让冲突双方或多方开始反思之所以冲突的问题、问题的本质以及其能否化解与化解途径等。这种反思使冲突各方的长短、优缺都凸显出来，各知其短之所短，长之所长，便可择人之长以补己之短，以己之优以优人之优，这是文明冲突过程中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佛教文化在吸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而逐渐中国化，中国传统儒教文明和道教文明也在与佛教文明的融突中得以细密化、逻辑化。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和道教精密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过程，给儒教学者以极大的震撼和冲击，儒教文明必须改弦更张，吸收佛道之长，融突创新，使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方法论争转化为落实到新的和合体上，即理学哲学和合体，促其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

佛道二教价值观的传播，导致“去君臣之礼，绝父子之戚，灭夫妇之义，儒者不以仁义礼乐为心则已，若以为心，得不鸣鼓而攻之乎？……矧以夷狄诸子之法，乱我圣人之教，其为辱也大矣！”^①孙复认为这是儒教之辱，这就给儒

^① 孙复：《睢阳子集》，《泰山学案》，《宋元学案》卷二，《黄宗羲全集》第三册，第140～141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教的伦理纲常、价值理想以严峻的冲击，佛教的般若智慧、涅槃妙道和道教的玄之又玄、清静无为的理论体系，也为知识精英们所倾慕。然从唐代韩愈以来，以佛教文明为夷狄，认为其不是中华道统和文脉的传承，因此提出与佛教法统相对待的道统论，宋明理学家为建构度越佛老的新的儒学理论思维形态，继承和凸显道统论，批判佛道二教，以为自己的新理论思维形态的合理性、合法性作阐述。但儒教之所以能度越佛道二教，就在于理论思维上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盲目地拒斥，而是合理地吸纳；不是保守旧教条，而是开出新生面。如此必须了解佛道，深入佛道理论思维，达到“尽究其说”，才能度越佛道理论思维，于是理学家都出入佛道。张载是读《中庸》而觉犹未足，而去累年尽究佛老之说；程颢为求知而广泛地博览群书，出入释、老几十年；朱熹体认到为己之学有未得其处，而出入释、老，他赴进士试，只带《文慧语录》在身边。他们对佛道的理论思维，不是犹柳宗元批评韩愈那样只知其“石”，而不知其“韞玉”的。一般而言，他们对佛老之学都有较深的造诣，而后反诸《六经》。他们是在把佛道之学与儒教《六经》之学放置在同一个平台上，在比较中获得新体贴、新体验的，在儒、释、道三教对话、互动中取长补短，融突和合，从而转生为新儒学的理学，实现了从隋唐以来儒、释、道三教之学向理学理论思维形态的转变，并落实了三教“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方法。宋明理学文明的转生，化解了由儒释道三教冲突所带来的文明危机。

第四，儒学式微冲突和其生命智慧危机。宋代思想家、哲学家体认到，要复兴儒教，必须探索、检讨儒学式微的原因，因而当时士大夫的精英们都从精神价值导向、理论思维层面进行反思。这个反思在韩愈那里已被强烈地意识到，他认为孟子之后儒学就成为绝学。“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杨则之墨，杨墨交乱，而圣贤之道不明，则三纲沦而九法斁，礼乐崩而夷狄横，几何其不为禽兽也！……以至于秦，卒灭先王之法，烧除其经，坑杀学士，天下遂大乱。及秦灭，汉兴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故学士多老死，新者不见全经，不能尽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见为守，分离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圣入之道，于是大坏。后之学者无所寻逐，以至于今……汉室已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浸以微灭。于是时也，而倡

释老于其间，鼓天下之众而从之。呜呼，其亦不仁甚矣！”^①韩愈的历史反思既有思想层面的杨墨和佛老对儒学的冲击，又有政治层面的焚书坑儒，再有学者各以所见为守，分离乖隔，以至大坏圣人之道，儒学面临危机。韩愈以“道统”承传者自诩，担当复兴儒学的重任。

韩愈对儒学危机的体认，获得宋代学者的认同。孙复说：“孔子既歿，七十子之徒继往，《六经》之旨郁而不章也久矣。加以秦火之后，破碎残缺，多所亡散。汉魏而下，诸儒纷然四出，争为注解，俾我《六经》之旨益乱，而学者莫得其门而入。……又后之作疏者，无所发明，但委曲踵于旧之注说而已。”^②汉时诸儒纷起注释经典，便有今、古经文之争。这不仅乱了《六经》，而且使学者不得门径。儒衰的原因在于注疏者不能发明创新，陈陈相因，使儒学教条僵死，而丧失其生命智慧。李觏在回答释老“修心养真，化人以善，或有益于世”时说：“夫所谓修心化人者，舍吾尧舜之道，将安之乎？彼修心化人而不由于礼，苟简自恣而已矣。昔孟子之辟杨墨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今山泽之臞，务为无求于世，呼吸服食，谓寿可长，非为我乎？浮屠之法，弃家违亲，鸟兽鱼鳖，毋得杀伐，非兼爱乎？为我是无君，兼爱是无父，无父无君，不忠不孝，况其弗及者，则罪可知矣。”^③佛道对儒学及国家社会之害，尤如杨墨。他们使儒教学绝道丧，国弱民贫。只有去佛道的“十害”，才能使人民乐业，国家富强。这种儒教复兴的诉求，是与国家意识相联系的。

如果说李觏从政治哲学层面反思儒衰，那么，王安石从学术思想层面反思儒衰。“然孔氏以羈臣而兴未丧之文，孟子以游士而承既没之圣，异端虽作，精义尚存，逮更煨燬之灾，遂失源流之正，章句之文胜质，传注之博溺心，此淫辞诡行之所由昌，而妙道至言之所为隐。”^④孔孟之学既遭秦焚书坑儒之灾，又遭汉儒章句传注之繁，丧失源流之正，出现“文胜质”、“博溺心”的弊端，造

① 韩愈：《与孟尚书书》，《韩昌黎集》卷十八。

② 孙复：《寄范天章书》，《孙明复小集》，《四库全书》本。

③ 李觏：《富国策第五》，《李觏集》卷十六，第1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④ 王安石：《除左仆射谢表》，《王临川全集》卷五十七，第361页，上海，世界书局，1935。

成“淫辞诡行”昌盛，而“妙道至言”隐退的情境。

张载和二程均有鉴于儒学精髓在秦焚书后遂失的形势和汉儒“只是以章句训诂为事”^①，失却儒学真精神的情况，主张回到儒学源头孔孟那里去。张载认为，自佛教“其说炽传中国，儒者未容窥圣贤门墙”^②，又“不知反约穷源，勇于苟作”^③。只有穷儒学之源，才能体认儒学真精神，而度越“汉儒补缀，千疮百孔”的弊病，不至“沦胥其间”。程颐批评汉儒解经，“《尧典》二字，至三万余言，是不知要也。东汉则又不足道也”^④。这只能散乱破碎儒学的本真。

宋代思想家、儒学家对儒衰道盛、儒弱佛强的反思，是要重新唤起儒学的生命智慧。如此，必须从笃守汉唐对儒家经典文本的章句训诂中解放出来，从“师法”、“家法”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从“疏不破注”的陈陈相因中冲决出来，只有转汉唐章句训诂之学成“六经注我”的义理之学，才能使儒学开出新生命，化解生命智慧的危机。

二、新文化新学风

宋代思想家、哲学家面对此四大冲突和危机，都怀有担当化解冲突和危机的价值自觉意识、智能创新意识、历史责任意识和忧国忧民意识。然而，学术思想的创新、哲学体系的建构，不仅需要哲学家的自觉担当，而且需要有宽容的人文语境。尽管政治、经济对哲学思想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比较直接的是文化政策所营造的文化氛围，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家国同构的中央集权社会中，若无比较自由的、宽松的思想学术环境，哲学的智能创新是很难实现的。北宋的“佑文”文化政策为道学的化生提供了政治的、人身的保障。赵匡胤有鉴于唐末五代武臣拥兵自重，谋权篡位的教训，“由是大重儒者”^⑤。对儒者采取宽容和保护政策，并立下誓碑，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⑥。这

① 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② 张载：《万吕微仲书》，《张载集》，第3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8。

③ 张载：《与赵大观书》，《张载集》，第3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8。

④ 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⑤ 《本纪·太祖三》，《宋史》卷三，第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⑥ 《君范》，《宋稗类钞》卷一，第1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就给了儒臣和士大夫以思想言论、著书立说的自由的、宽松的人文语境，使得儒臣、文官敢于针砭时弊，士大夫们亦敢于冲决传统经学权威的网罗，发扬理论思维创新的主动性，提出了种种创新的理论思维形态，推动了宋代哲学思潮的转换，开创了宋明理学的新时代。

王夫之曾说：“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殴刀之辟。张邦昌躬篡，而止于自裁；蔡京、贾似道陷国危亡，皆保首领于贬所。”^①士大夫为追求真理而“舍生取义”或“杀身成仁”，都可在所不惜，然而由于自己追求真理而累及九族甚至亲朋学生，这就比牺牲个人更可怕、更残酷，压力更大。“誓不杀士大夫”，不仅激励起士大夫们哲学思想创新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担当意识，而且让他们敢于冲决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人之言的“五经”的权威，士大夫们发号施令“疑经改经”，纷纷发挥各自思想智慧及哲学创新精神。他们以“自作主宰”的自由主体，互相探索论争，互相启发、吸收，“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在哲学论争中，他们能够做到尊重“他者”，作为论争对象是互为对象，相互平等。黄宗羲描述的朱熹与陆九渊“鹅湖之会”的论争，就是体现了学术思想论争的自由性、平等性，这样才能营造良好的学术思想人文语境和文化环境，促使哲学思维的发展，这就是如王夫之所说“宋之士大夫高过于汉、唐者”^②的原因所在，也造就了新的理学哲学思潮的化生。

假如两宋的学术思想、哲学思维的论争维持在良性和学术自由的环境之中，那么，中华学术、哲学成就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造极”。然而，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都是一身兼任、官学同位，没有纯粹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们既关注形而上学之道的求索，也关怀形而下百姓的日用。他们怀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宏大抱负，不仅为“继绝学”而提出各种创新的哲学思想、逻辑体系，而且为“开太平”而设计种种政治改革方案和主张。两者相辅相成，相依不离。这不仅制约了其哲学思维的深入和体系创新的成就，而且往往易于

① 王夫之：《太祖》，《宋论》卷一，《船山全书》第十一册，第24～25页，长沙，岳麓书社，1992。

② 王夫之：《太祖》，《宋论》卷一，《船山全书》第十一册，第26页，长沙，岳麓书社，1992。

把学术思想的论争引向政治论争，也易于把学派之间的论争转换为党派之间的斗争，把学术思想的论辩引向歧途。

“庆历新政”把一批士大夫中的精英分子推上政治舞台，他们直言说论，廉耻相尚，名节相高，成为士大夫的新风尚。“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说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①。当时士大夫们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危机，司马光（涑学）、二张（张载、张戡兄弟，关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洛学）、二苏（苏轼、苏辙兄弟，蜀学）都提出改革的主张。“熙宁变法”之初，其中有的支持变法，有的同情变法，也有的反对变法。张戡支持变法，二程也曾持支持态度。程颢说：“或谓：人君举动，不可不慎，易于更张，则为害大矣。臣独以为不然。所谓更张者，顾理所当耳。其动皆稽古质义而行，则为慎莫大焉，岂若因循苟简，卒致败乱者哉？自古以来，何尝有师圣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将大有为而返成祸患者乎？愿陛下奋天锡之勇智，体乾刚而独断，霁然不疑，则万世幸甚！”^②他批驳了以更张为大害的论调，要求神宗刚乾不疑，不要因循守旧，以致败乱，要改易更张，变法图强。同时程颢既批评“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于今”的陋儒之见，又批评“谓今人之情皆已异于古，先王之迹不可复于今”的“祖宗不足法”之见。^③程颢《论十事札子》在“为往圣继绝学”的思想指导下，认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验”，并非都是“迂疏无用”之说。这就与王安石的“三不足畏”思想殊异，再由于改革的具体方案、方法措施的分歧，王程之间便发生冲突。“荆公尝与明道论事不合，因谓明道曰：‘公之学如上壁。’言难行也。明道曰：‘参政之学如捉风。’及后来逐不附己者，独不怨明道”^④。这种冲突往往是思想的、政治的、情感的纠缠在一起，以至荆公新学与洛学发展为互相排斥，形同水火。元祐元年（1086年），反对变法派在高太后支持下执政，熙宁新法被

① 《列传·忠义一》，《宋史》卷446，第131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② 程颢：《论王霸札子》，《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二程集》，第451～4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③ 程颢：《论十事札子》，《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二程集》，第4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④ 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二程集》，第2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废，变法派遭排斥。其间程颐洛党与二苏蜀党又发生冲突，程颐遭弹劾。^①次年罢经筵，洛党有关人士罢外或迁职。绍圣四年（1097年），新党又当政，再贬元祐党人，程颐被送涪州编管。不断的党争使相关的士大夫精英们被党争所困囿，不能进行理智的学术探讨，特别是不能在不同意见（包括不同政见）间进行学术论辩。不同学派利用其当政的政治权势，排斥、打击异己学派，甚至利用行政手段，制造“元祐奸党”案等。这样就堵塞了不同学派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也丧失了互相汲取和融合，妨碍了北宋哲学思想更辉煌地发展。

南宋时期朝野上下为靖康之耻所笼罩，抗金成为首务。政治论争主要围绕战与和而展开，哲学思想的论辩还可在一定学术范围内进行，而较少受党争的干扰。如朱熹与陆九渊鹅湖之会的论争，朱熹与陈亮王霸义利之辩等。然而一旦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也难逃被打击的后果。朱熹就是在赵汝愚与韩侂胄的政治斗争中被牵涉，而成为“伪学逆党籍”中的重要一员。破坏了自由的、平等的对话和辩论的氛围，于学术思想、理论思维的发展大有妨碍。中国的学术思想、理论思维总是在与政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发展——压抑——发展。这就是说，尽管政治干预学术思想、理论思维，但学术思想、理论思维有其特然卓立的品格，有其自身内在逻辑发展的理路，因此，哲学理论思维在“不杀士大夫之誓”的人文环境中，以士大夫自觉担当创新哲学理论思维、重构伦理道德、重建价值理想的思议下，两宋哲学理论思维仍然争得卓越发展的空间。既为化解所面临的四大冲突和危机营造了良好的外在因缘，也开发出士大夫们智能创造理论思维、价值理想的潜能，激荡起转隋唐儒释道三教之学为宋明理学的哲学思潮。

三、理学思潮的演变

从理学哲学思潮自身逻辑演进来看，经历了开创、奠基、集成、解构、总结等阶段。前人也曾对理学哲学思潮演进的阶段性做过思议。如黄宗羲说：“有

^① “左谏议大夫孔文仲言：谨按通直郎崇政殿说书程颐，人物纤污，天资辘巧。贪黷请求，元无乡曲之行；奔走交结，常在公卿之门；不独交口褒美，又至连章论奏；一见而除朝籍，再见而升经筵。臣顷任起居舍人，屡侍讲席，观颐陈说，凡经义所在，全无发明，必因藉一事，泛滥援引，借无根之语，以摇撼圣听，推难考之迹，以眩惑渊虑。”参见《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二程集》，第4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宋以来，所未有也。识者谓五星聚奎，濂洛关闽出焉；五星聚室，阳明子之说昌；五星聚张，子刘子之道通，岂非天哉！岂非天哉！”^①他以五星聚奎、聚室、聚张，来诠释理学思潮演进的三个阶段。所谓五星，是指金木水火土，五星会聚二十八宿^②中奎、室、张的天文现象，来说明理学思潮的变化。其意是说当五星聚会在西方七宿中的奎宿时，为理学从开创、奠基到集成时期，其时濂学、洛学、关学和闽学四大理学主流派相继化生；当五星聚会在北方七宿中的室宿时，为理学转向解构时期，王阳明心体学昌盛流行，王廷相等气学复兴，程朱道学面临心体学、气学学的解构；当五星聚会在南方七宿中的张宿时，为刘宗周会通和总结理学时期。黄宗羲把其老师刘宗周的蕺山学派与程朱道学、阳明心体学鼎足而三。由于王夫之与黄宗羲为同时代的人，所以船山学未在黄宗羲的视野之内。黄宗羲理学哲学思潮演进三阶段说，虽显简要，然基本上符合理学主流派演进的价值指向。

理学思潮的开创与当时“庆历新政”的社会改革运动有一定联系，社会改革运动唤发了思想家的智能创新思想，使他们从唐至宋初在政治、经济、伦理层面批判佛道思想的老套子中度越出来，转而从理论思维的“本然之全体”上思议融突儒释道三教，理学的开创，标志着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方法的落实。

周敦颐被后来道学家推为理学开山者、理学哲学思潮的奠基者。二程曾师从周敦颐，又同邵雍交往密切。另一奠基者张载不仅与二程有叔侄关系，而且能互相交流探讨学术思想。二程和张载之所以为理学哲学思潮的主流派和奠基者，是因为：其一，凸现了理气范畴在理学中的重要地位，为理学家追求自然、社会、人生的“所以然”与“所当然”奠定了逻辑基础。其二，在探赜自然、社会、人生内在根据上，和在心性、格致、知行等方面，他们提出了诸多备受

① 黄宗羲：《忠端刘念台先生宗周》，《明儒学案》卷六十二，《黄宗羲全集》第八册，第891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② 二十八宿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对天体黄道、赤道附近恒星所作的区域划分，春秋时已有。如东方七宿是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七宿是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七宿是奎、娄、胃、昂、毕、觜、参；南方七宿是井、鬼、柳、星、张、翼、轸。为东、北、西、南二十八宿。

后世所关注的哲学命题和诠释范畴，为理学思潮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其三，张载和二程哲学地体现了其道体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的融合，使儒教伦理获得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支撑，他们视“人性”为“天理”，将人伦秩序形而上化，道德精神本体化，在天人和合的框架内建构了理学的价值可能世界和精神家园。其四，辟佛道二教。张、程超越了韩愈未能从本然之全体上和孙复、李觏等从政治伦理上批佛道二教思想的局限，从理论思维上融突二教思维，“统合儒释”，在互动对话、互补互济中，开出新思维、新哲学。尽管张、程因在批判与吸收佛道思想的侧重面、方式方法上不同，而有其不同的特色，但殊途同归，他们为理学思潮的哲学核心话题、理气心性话题作了精到的诠释，成为宋元明清理学家不断思议和诠释的范畴，并借以构建各不相同的哲学逻辑结构。

宋明理学哲学思潮经北宋百余年演化，到南宋渐趋成熟，著名理学家辈出。朱熹作为道学的集大成者，在南宋学派涌现、众星聚奎中，脱颖而出。朱熹的思想体现了历史的脉搏、时代的精神，成功地化解了当时所面临的外来文化的冲击、理论形态的转型，以及重建价值理想、精神家园的挑战。他的哲学思维逻辑结构“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①，被认为是孔孟以来中国文化之集大成者。他融合儒、释、道及诸子各家之学，而归宗为儒。他把自然、社会、人生，以及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和可能世界都统摄在其博大深奥的理学思维逻辑结构之内，成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

与朱熹同时，湖南有湖湘学派，浙江有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婺学），江西有金溪学派（陆学）等。他们之间互相论辩，切磋学术，或集会，或访问，或通信，往来密切，互相促进。在较为宽松的文化氛围、人文语境中，构建了自由创造理论思维的平台，从而结出丰硕的哲学成果。

朱熹、张栻、吕祖谦齐名，被称为“东南三贤”。陈亮说：“乾道间，东莱吕伯恭、新安朱晦庵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世学者宗师。”^② 淳熙间

^① 黄宗羲：《晦翁学案》，《宋元学案》卷四十八，《黄宗羲全集》第四册，第816页，引全祖望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② 陈亮：《与张定叟侍郎》，《陈亮集》卷二十九，第3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74—1189), 张栻、吕祖谦卒, 永嘉之学与闽学及江西之学遂成鼎足而三。全祖望在《水心学案序录》中说: “乾淳诸老既歿, 学术之会, 总为朱、陆两派, 而水心断断其间, 遂称鼎足。”^① 朱熹继二程、张载, 融合佛道, 而成“道学”之集大成者。陆九渊发挥程颢, 而自成“心学”。陈亮、叶适等间接继王安石的事功和革新思想, 而成事功之学。朱、陆卒后, 两家各成门户, 互为水火。朱陆异同之争, 成为学术界的大“公案”, 一直延续到明清。

元代“设科取士, 非朱子之说者不用”^②, 并将其“定为国是”, 使“学者尊信, 无敢疑贰”^③, 故朱子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被强化, 陆学受压抑, 以至逐渐湮没无闻。明初, “颁科举定式, 初场试《四书》义三道, 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 《易》主程《传》、朱子《本义》, 《书》主蔡氏(沈)《传》及古注疏, 《诗》主朱子《集传》……”^④ 朱棣敕胡广等纂修《四书大全》、《性理大全》, 都主朱子学。一时宋濂、方孝孺、薛瑄等都为朱学矩矱。再由于官方的倡导, 便左右学风, 其结果造成: 一是, 以朱子学为正统, 视其他学说为异端邪说, 扼杀了学术争鸣的空气, 亦限制了朱子学自身的发展。二是, 朱子学既为科场所主, 便成为士子们死背硬记的伦理教条, 猎取功名利禄的知识工具。朱子学渐次僵化, 丧失了作为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的功能, 削弱了朱子学内在的生命智慧。三是, 朱子学内在在道德理性与现实感性之间的冲突更加暴露, 便孕育了王守仁思想的产生, 开出了对程朱道学的心学解构。

“有明学术, 白沙开其端, 至姚江而始大明。”^⑤ 黄宗羲称陈献章和王守仁“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⑥。陈氏弟子湛若水与王守仁本有学术往来, 然而王守仁从不提与陈氏学术关系, 并以直承陆九渊“心学”之旨自诩。在朱熹“道学”居统治地位的时候, 凡与朱子学不合之处, 均被视为异端。虽王守仁“范围朱

①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五十四,《黄宗羲全集》第五册,第106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② 《儒林一》,《上饶县志》卷十九。

③ 虞集:《跋济宁李璋所刻九经四书》,《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九。

④ 《选举志二》,《明史》卷七十,第169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⑤ 黄宗羲:《姚江学案》,《明儒学案》卷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⑥ 黄宗羲:《白沙学案》,《明儒学案》卷五,《黄宗羲全集》第七册,第78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陆而进退之”^①，并编《朱子晚年定论》，说明朱熹晚年和陆九渊学旨不违，但实是对朱熹道学的解构。在这种情况下，王守仁以陆九渊为旗帜，不仅是其思想内在逻辑的必然发展，而且是宣扬其学说，减轻舆论压力的需要。虽然程、朱“道学”，陆、王“心学”同属宋明理学主流派，但宋明理学发展到王守仁及其门弟子，便逐渐显现其解体态势。王夫之说：“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中国沦没，皆惟怠于明伦察物而求逸获，故君父可以不恤，肤发可以不顾。”^② 陆子静出而宋亡，其流祸一也。“心学”的分化、解构乃是王守仁哲学思辨结构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作为理学的整个行程，“心学”的解构，亦标志着整个理学走向解构。

王夫之在这种情况下，忧国忧民，在抗清失败、南明腐败的颠沛流离中，对宋明理学有了更深入的体验。他出入佛道，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精神归宗和发扬儒学为职志。他所谓的“生面”，是试图在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中开出新的生命智慧，相对于程朱、陆王而开出新的路向。这便是“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③，他以张载之学是孔孟之后的“正学”。“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张子之功又岂非疏泽水之岐流，引万派而归墟，使斯人去昏垫而履平康之坦道哉！”^④ 故此张子的“正学”，实乃孔孟以来之“正学”，由此而发宋明理学中气体学一脉，在罗钦顺、王廷相、吴廷翰之后，而成为气体学的集大成者，把中国哲学中的气体学发展到一个高峰。

四、理学的延续

理学的总结，蕴涵着对宋明天理价值观的解构。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哲学家在“天崩地解”的悲愤中，激起了对明代意识形态和朱王空疏而不着经济事功的批判，甚至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君主专制制度的最高统治者君主。“天下之大

① 黄宗羲：《师说·王阳明守仁》，《明儒学案》卷首，《黄宗羲全集》第七册，第15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② 王夫之：《可状篇》，《张子正蒙注》卷九，《船山全书》第十二册，第371页，长沙，岳麓书社，1992。

③ 王夫之：《自题墓石》，《薑斋文集补遗》，《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第228页，长沙，岳麓书社，1992。

④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船山全书》第十二册，第12页，长沙，岳麓书社，1992。

害者，君而已矣”^①。指斥君主为独夫，视如寇仇。意蕴着民权思想的跃动和新的理论思维形态转生的可能。然而，这种可能性的机遇在清入关后又丧失了。清兵在南京、江阴的屠城，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惊天下，中原和沿海的农业文明和城镇工商文明被破坏殆尽，加以实施严格的海禁，由明代所复苏的宋代商品经济中所蕴涵的资本主义因素，又一次夭折了，为中华民族的落后种下了祸根，使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距逐渐拉大。

清代在学术思想方面实行惨绝人寰的文化恐怖主义的文字狱，桎梏了理论思维的义理创新。同时，清代统治者又把已遭心体学和气体学批判和破绽已显的程朱道学提升起来。康熙命熊锡履、李光地等编《朱子全书》，并亲自作序：“二程之充养有道，经天纬地之德，聚百顺以事君亲，前儒已诵之矣。至于朱夫子集大成而绪千百年所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释《大学》则有次第，由致知而平天下，自明德而止于至善，无不开发后人而教来者也。……虽圣人复起，必不能逾此。”^②把朱熹崇尚为圣人，并认为即使圣人复起，也不能超过朱熹，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程朱道学作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地位更进一步得到加强，学术界、思想界只能严遵程朱思想的一定之规。虽后来戴震、颜元对程朱道学有所批评，但其作为统治意识形态已不可动摇。即使是戴、颜以及后来与程朱道学持异见者，也未离宋明理学哲学思潮中的陆王心体学，或张（载）、王（夫之）气体学，以至现代新儒学接着程朱讲的“新理学”，接着陆王讲的“新心学”，接着张王讲的“新气学”，其核心话题仍是理气心性，其依傍的诠释文本仍是《四书》，因此说，现代新儒家是宋明理学延续，是为理学延续期。

① 黄宗羲：《原君》，《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3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② 《御制朱子全书序》，《朱子全书》第二十七册，第8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